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实辨析】	张春桥的“叛徒”之疑	贺越明
【史海钩沉】	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	韩 钢
【往事非烟】	吴晗为何被送上“文革”祭坛	虞云国
【劫后反思】	人类从不继承国王思想——兼谈文革初期自己的一点记忆	闵良臣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实辨析】

张春桥的“叛徒”之疑

• 贺越明 •

回看中国大陆政治舞台上那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长剧，张春桥活跃而醒目的身影，是无论如何不能亦不该被忽略的。十来年里，他春风得意，扶摇直上，身居党政军要职，更有上海作为基地遥领风气之先。如若不是在1976年10月6日那个夜晚，与王洪文、姚文元和江青等人在同一时段被拘押审查，并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被开除党籍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他的人生履历及命运由此而改写，不知其极左派理论家的角色还会有怎样独特的演出！经历文革的人们大都知道，张春桥不论是作为动乱年代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还是沦为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获刑罪犯，一直有个“叛徒”嫌疑的问题缠绕着他，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而且至其病死之后。文革结束时，一般民众议论张春桥也有类似的话语：这个人，一看就像是叛徒！然而蹊跷的是，那顶“叛徒”的帽子仿若高悬在他的头顶，从来没有戴上去。不久前北京某学者发表有关张春桥的文章，也提到他深受毛泽东器重和眷顾，“甚至对党内一些老人告状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毛泽东也是置之不理”。那么，张春桥历史上究竟是不是“叛徒”？党内的老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告这个状的？毛泽东何以置之不理？研究作为文革代表人物的张春桥，这些都是难以回避且应当搞清楚的问题，况且从中还可引发某些必要而有益的思考。

◇ 红卫兵“炮打”首度质疑

上世纪60年代前期，张春桥的政治地位不高。1962年6月16日，他出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5日，改当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因协助江青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改编成“革命样板戏”，其间又参与江青根据毛泽东主席旨意，指派姚文元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1965年3月5日升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终于成为市委领导成员。等到文革的战幕正式开启，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张春桥一跃而为副组长。虽然称作中央首长还有些“名不正”，但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再仅仅是地方干部，而是成了毛泽东为首的所谓无产阶级司

令部的重要成员。可是，在运动初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政治气氛中，这位一开始就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左派大将，也没能避免被群众组织“炮打”的风浪。而且，前后两次“炮打”影响很大，不仅当年的参与者刻骨铭心，一些健在的老上海人也记忆犹新。这两次“炮打”事件有个共同之处：质疑张春桥曾经是“叛徒”。

第一次“炮打”发生在1967年1月下旬。在红卫兵和造反派轮番冲击下，上海原有的党政领导机关几近瘫痪，开始酝酿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并作人事安排。由于张春桥作为中央文革副组长，先是奉派回上海处理“安亭事件”时支持了造反派，获得毛泽东的首肯和赞赏，二度回沪后又拉拢造反派打击赤卫队，基本上操控了整个局面，正待几个大的造反组织推举和中央任命为新领导人。这引起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孙悟空”战斗队负责人胡守钧的焦虑。他对张春桥不满和怀疑，起因是张肯定的该校一位原工人出身的工程师宣布造反后又去祝贺赤卫队成立，近因是张下令抓捕擅自夺权的上海戏剧学院学生、“红三司”负责人赵全国，远因是发现30年代张曾化名“狄克”撰文攻击鲁迅，而旁因则是获悉张的妻子文静历史上有过“自首变节”行为。基于这一切，“孙悟空”战斗队于1月23日夜分头行动，从校园到市区主要马路张贴矛头直指张春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其中比较醒目的有“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其时，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副组长王任重被抛出打倒不久，学生们以为炮打张春桥也顺理成章。过了两天，“孙悟空”战斗队又贴出《一问张春桥》和《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大字报。随即，复旦大学“反复辟”战斗组、红革会等组织也加入了“炮打”的行列。

给这场“炮打”之火添了一把干柴的，是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红革会负责人池东明率助手调查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于1月下旬从北京高校获得有关讯息后转赴西安交大，亲耳听到关在该校的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说：“我用脑袋担保，张春桥是叛徒！”（卞全：《池东明炮打张春桥》，载2011年1月《炎黄春秋》）霍士廉曾在与上海相邻的浙江省工作多年，又用脑袋担保，联想到张妻曾自首变节，红卫兵们信以为真。于是，张春桥是“叛徒”的说法就此流传开来。1月28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到上海展览馆咖啡厅，与正在开会的各高校红卫兵组织负责人见面时，不仅当场遭到围攻，还差点被挂上“打倒大叛徒张春桥”的牌子。在小将们的眼里，张春桥可以和叛徒划等号了。2月2日凌晨，不少高校的红卫兵组织联合发起，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炮打张春桥的游行示威。

上海红卫兵反对张春桥的行动，惊动了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就在“炮打”即将升级之际，他亲自口授由王力起草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发往上海，包括“红革会”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是完全错误的等五项内容，表明力保和支持张春桥的态度，以至高无上的权威立即平息了这场来势凶猛的“炮打”。以后几年里，凡是参与“炮打”的各校学生，几乎都遭到程度不同的报复和迫害，其中有些人被逼疯或自杀。

◇ 报人又起疑窦再“炮打”

尽管高校红卫兵的“炮打”行动被压制下去，张春桥如愿当上了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又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和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对他的不满和怀疑并未烟消云散。进入1968年，社会上又出现一些有关“叛徒”的传闻，如“中央两报一刊的记者在复旦开座谈会，说张春桥是叛徒，已经撤职了”；又如“张春桥找主席承认了自己有变节行为，主席听了很生气，已决定撤销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载上海市总工会档案：《工总司1968年给毛泽东的电报》，转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14页），传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

这年3月24日和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工人体育场分别举行了万人和10万人大会，是宣布撤销杨成武的代总参谋长、余立金的空军政委和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的重要集会，党中央领导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并讲话，毛泽东和林彪还亲自莅临前一个大会，而两次大会唯独张春桥缺席。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红旗战斗兵团随即在附属长征医院、市革委会和市委所在地，贴出大字标语“打倒杨、余、傅在上海的黑后台！”虽然没有点名，但引发人们猜测，因上海勉强可以成为“黑后台”的非张春桥莫属。这一动向，引起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长、《文汇报》负责人朱锡琪的注意。在与张春桥近距离接触中，他本来已经有些反感，这时便推测张很可能出了问题。4月10日，朱锡琪又接到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艾玲来电，说她在几所大学听说了霍士廉用党籍保证张春桥是叛徒的传闻。这与此前红卫兵“炮打”时所传的内容，区别仅在于“脑袋”和“党籍”的不同。艾玲还称其丈夫看到一些中央绝密档的收件人包括中央文革的成员，名单里偏偏没有张春桥。艾玲的丈夫贺瑞林时任总参二部副部长，这一发现无疑可靠而令人信服。

于是，朱锡琪以“为什么战斗队”的名义拟出了10个“为什么”，作为向张春桥发难的口号。这10条口号在报社部分同事中传看时，有位编辑顺手加了一句：“揪出大叛徒！”口号中原先给张春桥定的罪名，是揪军内一小撮、篡改毛主席最新指示等，同事这一加，朱锡琪马上想到：怎么连这么大一件事都没写上去？4月12日凌晨，朱锡琪和观点相同的8位同事带上传单，乘车到同济大学散发了一批，很快激起了反响。当天上午，许多人到报社了解情况，南京路、淮海路上贴出不少大字报，其中有些对张春桥直接指名道姓。一天之内，掀起了第二次“炮打”事件。由于这次有军队院校参与，江青让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出面，在当天傍晚发出三点电话指示：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不要搞反击。这一来，形势急转直下。

第二天，文汇报发起“炮打”的朱锡琪等3人被召到市革委会礼堂，参加一个已作布置的辩论大会。在东海舰队司令高志荣宣读李作鹏的三点指示后，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开始讲话，把这次“炮打”张春桥与1927年蒋介石策动的“四·一二政变”相提并论，指斥“反对张春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他还以肯定的语气说，张春桥没有历史问题，没有坐过牢，有什么理由反对张春桥？朱锡琪只好举出几个最近的事例，与之辩论（朱锡琪：《我与“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载2011年9月《炎黄春秋》）。大会结束不久，朱锡琪和另一位负责人被隔离审查，不停地检讨错误、接受批斗，半个月后才恢复工作，但被撤销一切职务，还背上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 周恩来向邓小平交底

这两次上海群众的“炮打”事件，发生在文革前期，起因都包含对张春桥当过叛徒的怀疑。但无论高校的红卫兵还是报社的造反派，听到并采信均为传闻，没有多少真凭实据，因而不能把“叛徒”当作一发重磅炮弹，给这位政坛新贵以致命的一击。相反，经历过两次“炮打”的张春桥，不仅毫发无损，而且平步青云。1969年4月，他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进入政治局，并成为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1年10月，又成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显然，他已跻身于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之列，但职责和影响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1970年8月下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张春桥预先领悟毛泽东关于“天才论”和不设国家主席的真正想法，在讨论修改宪法时坚持删除鼓

吹“天才论”的语词，遭致林彪的几员军中亲信及其他将领群起围攻，人人喊打，顿时陷入困境。毛泽东听取汇报后以雷霆之怒说出硬话，开始扭转大局，并抛出陈伯达，剑指幕后的林彪。也因此，张春桥更成为军中林彪一派的打击对象。林彪之子林立果时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在庐山挫败后第二年3月和同伙拟议了谋划政变的《“571”工程纪要》，其中“实施要点”部分“第二阶段：实施阶段”中，列明“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571”工程纪要》，中发（1972）4号文件）。可见，这些少壮军人虽不握有确凿的证据，也决定一旦政变成功，把张春桥当作“叛徒”处置。

在中央高层，把张春桥视为“叛徒”的还有人在。据邓榕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披露：1973年4月9日下午，从江西回到北京等待复出的邓小平偕夫人卓琳去玉泉山看望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见面后，“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他对着卓琳特别嘱咐：‘卓琳，你不要说出去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275页）这段文字之前，作者有一句铺垫：“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邓小平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周恩来讲出来的这个话，即“张春桥是叛徒”。邓榕是邓小平和卓琳的女儿，此处陈述的事实应得自父亲或母亲。这番言谈表明，周恩来认为张春桥是叛徒，而这个“埋藏心里多年的话”有丰富的潜台词：一是张有“叛徒”的历史问题，是其政治上的软肋；二是他曾向毛泽东提出过这个问题；三是毛泽东不让调查，显示很看重甚至庇护张；四是他表示对邓的信任和期望，形成与张对立的阵营。书中没有述及邓小平对此的反应，这符合他平时寡言少语的特性，但周恩来的这个交底使他明白：张春桥是他的主要政治对手，其时深获毛泽东的信任。

◇ 康生临终密报毛泽东

现在已经难以考订，周恩来关于张春桥是“叛徒”的这一认知来自何处：究竟是来自像霍士廉这样的党内高级干部，还是来自参加“炮打”的群众议论及大字报？但至少可以肯定，不会是来自档案中正式的组织结论。恰恰是这一点，与周恩来的身份、作风及性格均不相符。他是心细如发之人，偶为部属证明经历和表现也讲究准确，体现了对人对事的负责和严谨，但涉及张春桥的个人政治历史问题时并非如此。

1974年12月下旬，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在居停那里的毛泽东汇报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关涉全国人大常委会及政府组成人员事宜。26日晚上，毛、周二人为此长谈4个小时。谈话中，“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93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87页）。这是周恩来再度提到张春桥的历史问题的文字记载，表明对此耿耿于怀。在决定中央政府人事布局的关键时刻，向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可谓不失时机，用心良苦。此前的1972年8月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要求做点工作的来信上批示，提到“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作为考虑邓小平复出的理据之一。那么，周恩来表示对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怀疑”，正可巧妙地抵销了毛泽东可能对邓小平文革初期犯有“路线错误”的疑虑，使得运动以来一贯正确的张春桥相形见绌，落于下风。很难判断这一“怀疑”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对人事安排的决策，但翌年1月中旬国务院组成人员在四届人大闭幕时公布，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正处总理周恩来的接班顺位。事实也证明，毛泽东回应的“已经知道了”实际上是不以为然，张春桥在党内是常委，副总理之位居于老资格的李先念前面。不仅

如此，与军队毫无渊源的他还获毛泽东提名，于1975年1月5日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眼见张春桥的权力范围扩大，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也就其历史问题发声。据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忆述，“1975年初冬的一个深夜里，……医院病房值班室的同志突然接到‘康办’的通知：‘康老马上要到医院看望总理’……周恩来闻讯后，马上吩咐医护人员撤除身上的输液装置等一切管子，赶紧帮助他下床，穿好睡衣，坐到轮椅上，送他到客厅，扶他下了轮椅坐到沙发上，让他一个人静静地等待康生到来”。重病的康生乘救护车抵达后，周恩来“用手示意屏退所有工作人员。……他们的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有关那次谈话的内容无人知晓。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断断续续地听到一点传闻，据说是康生在临死前，……去告诉周恩来，江青和张春桥在历史上有过政治变节行为”。（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285页）同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找来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和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让她们代为转告毛主席：“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都是叛徒。我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让我看的。”康还说这事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清楚，但一直没有向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梁红伍：《康生死前为何揭发江青和张春桥》，2006年9月《百年潮》）。这时，距康生病逝不到5个月。与“怀疑”的说法相比，康生的揭发更为肯定，加之他曾长期在中央分管组织人事，权威性无可置疑。文革后清算康生的罪责时，有人把此举称为江青集团内部的“狗咬狗”，也有人将之解读成康生的政治投机。无论他内心是否另有动机，如果确实与周恩来事先就此沟通后再托人向毛泽东报告，就不排斥是用政治历史问题力阻张春桥“更上一层楼”，成为毛泽东身后的接班人。其实，康生迟来的举发有明显的漏洞。比如，以他在党内的职权很容易调阅张春桥的档案，还需要江青让他看吗？既然看过档案，为何不具体举出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的证据？如果在延安时期就清楚，即使不便涉及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又有什么理由在整风审干中不及时挖出张春桥这个当时还无足轻重的“叛徒”呢？康生所言，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

◇ “叛徒”从未被捕和自首

从党外到党内尤其是高层时不时被视为“叛徒”，尽管有惊无险，张春桥本人即使不出一身冷汗，至少也会有所反应。其实，上海发生的两次“炮打”事件都涉及这个问题，他已清晰地表明态度。关于这一点，徐景贤的回忆录中有迄今唯一比较明确的记载：

有天晚上，张春桥在康平路小礼堂召集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会议，也请各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到会，听听外面的动向。

张春桥在会上问同济大学红卫兵头头陈敢峰：“最近有什么社会动向？”

陈敢峰说：“有人散布谣言，说张春桥是叛徒。”

张春桥听到这消息，脸色阴沉，非常生气地讲：“我从来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

……

张春桥在会上还说：“我过去太宽大了，今后要是听到谁再讲这种话，我就不客气了。”他说话的时候，手里还拿着烟，说完，把烟重重地在烟缸里掐掉。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老实说，我只要小指头一点，你就会完蛋！”……那天，朱锡琪也在。我对张春桥的

这段话是相信的：“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啊？”（徐景贤：《十年一梦》，现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版，第138页）张春桥为此而恼怒，一点也不奇怪。所谓“叛徒”，特指背叛祖国或背叛革命之人，要么背叛自己的阶级或集团而采取敌对行为，要么直接投到敌对的一方，前者往往是被捕后经不起威逼利诱尤其严刑拷打，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后者可能是鉴于形势恶化而丧失革命信念，主动向敌方自首并表示悔改。张春桥自投身革命后，一直身处根据地直到解放，从未脱离过革命队伍，上述两种情况都未发生过，从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是“叛徒”。

对于自身的经历，张春桥应该也是有底气的。1935年他从济南到上海时才18岁，是中学毕业不久的文学青年，先后加入了中共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第二年在不完全知情下，参加了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几个党员成立的中共预备党员委员会，该组织后被中共派人宣布取消。1938年到延安后，他因无入党证明，再度申请入党被吸收。1939年初，他在陕北公学任宣传科长时，毛泽东到校做报告前曾向他了解学员的思想情况。1940年被派赴晋察冀解放区，历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1949年5月随军进入上海，参与新闻业接管工作，7月至9月任《新闻日报》管委会委员，后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行政级别九级。1954年秋，石家庄时期的老上级柯庆施从江苏调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张春桥遂任其政治秘书，代为起草讲话稿和重要文件。1958年正月初二，在杭州的毛泽东召见柯庆施，并要上海市党代会政治报告的起草人随行。见面时，毛泽东拿着那份报告稿表示欣赏，询问张春桥的家乡、工作经历，得知他只是市委委员而没有具体职务时脱口称之“白衣尚书”。随后几天开会，每天一起边吃饭边谈问题，张春桥自此为毛泽东所熟悉。这一年9月15日，他在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大获毛泽东好评，指示《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写下编者按。从60年起，他便奉毛泽东之派，往来于北京、天津、郑州、遂平、范县和武汉参与调查研究，开始亲历中央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过程。

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史无前例，实际上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政治运动。张春桥一开始就厕身其间，从批判北京市领导吴晗、邓拓为前奏，到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鼓动机关干部揭竿而起，肯定记者、编辑接管报社，再到打倒大批负责干部，重组党政领导班子，几乎每个阶段都为毛泽东提供了可向各地推广的样板和经验。可以说，他前期主要用实践创新推波助澜，后期着重于“继续革命”理论装饰，立下汗马功劳，因而不间断获得提拔和擢用。1973年8月下旬中共十大召开，张春桥担任主席团秘书长，同年8月底一中全会上升为常委。需要留意的是，邓小平是在1975年1月上旬举行的中共十二中全会上，获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地位越过张春桥，由此奠定了在政府、军队中的领先地位。从这个时间点往前推移当可明白，周恩来在十多天前亦即1974年12月26日，向毛泽东提出对张春桥的政治历史问题的怀疑，起到的正是再设一块绊脚石的作用。同样的道理，老谋深算的康生自知不久于人世，而毛泽东的身体也每况日下，距大限不远，而接班的权力有可能落到张春桥和江青之手，又很难从他们的现行表现上做文章，只能就二人“莫须有”的历史问题向毛泽东进言，以期影响他对身后的接班人事部署。如果说，群众从道听途说产生对张春桥是“叛徒”的怀疑，反映了文革初期“揪叛徒”风刮向全国各地的混沌和失序，那么，政治手腕高超的党内元老直接把这一悬疑当作针对和打击张春桥的一大杀器，则充分显示文革后期中央高层斗争的尖锐、复杂和残酷。

◇ 诬陷他人难免咽苦果

在某种意义上，张春桥也属于自作自受，自食其果。

经过中央专案组认真和细致的调查，中共中央从1976年12月起先后发布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罪证之一、之二和之三，其中第二部分是各人的政治历史，对张春桥的定性是“国民党特务分子”。用当时的政治语言来说，可以证明“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但许多人困惑不解：不是一直有传闻说他是叛徒，怎么又成了比叛徒性质更严重的特务？这样一个国民党特务分子竟然能够混进中共并爬上高位，简直太不可思议也太可怕了！

1981年1月，张春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罪名包括：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发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二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这些罪名，似与国民党特务分子的身分没有关系，所谓历史上“叛徒”的嫌疑更是不再提及。当年说过用脑袋或党籍保证张春桥是叛徒的霍士廉其时还健在，前任中共山西省书记后当农业部部长，大概也没能为这个“叛徒”疑案的定论提出甚么有力的证据。

说起来有些讽刺，1967年10月，张春桥为了攫取上海的党政大权，蓄意压制和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市长曹获秋，示意市革会专案组将他们都定为“叛徒”。他对专案组负责人王少庸说：“按陈、曹问题，现有材料（定）走资派已足够了，（但）走资派、路线问题，用词松一些，还是内部问题。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就不同。”王少庸之后在传达时说：“他一讲，我就领会了。”（王少庸1967年10月23日传达张春桥讲话，转引自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1—1082页）以后，专案组想方设法拼凑证据，要把陈丕显和曹获秋定为“叛徒”，即使中央专案办公室不同意也要这样定性。可见，张春桥也深知，对提倡革命气节的共产党人来说，曾经被敌人抓获并自首，是一个很大的污点，政治生命就此终结。然而，当他和文革同道诬陷和迫害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及许多党政军干部，不断取得更高职位和更大权力时，自己也遭到对方以“叛徒”嫌疑为突破口的强力反击，无可避免地成为政治“泥浆大战”的牺牲品。对于一个尚未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政党而言，这可谓惯性使然，概莫例外。

□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2016年3月

~~~~~

## 【史海钩沉】

### 毛泽东晚年的“两件事”谈话

• 韩 钢 •

毛泽东晚年说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谈话流传已久，有关它的争议却持续不断（1）。关键在于，迄今为止查不到原始文献和权威的第一手资料。有关讨论似乎已经进入“瓶颈”，继续考证是否失去意义？回答不必过于僵硬。其实，正因为缺乏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进一步考证才更具有解释学意义，它不仅可以使问题的讨论一步步聚焦和深入，而且可以引申出更有意义的政治学问题来。本文即是对此作出的一种努力。

#### 一、版本及来源

毛泽东晚年所作“两件事”的谈话，大致有两类版本，可称为简化版和完整版（2）

简化版最早出自叶剑英。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叶剑英告诉与会者：“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3）这是毛泽东关于“两件事”谈话的第一次正式披露。毛泽东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谈话，叶剑英没有说明。从“我们”这个复数人称代词看，听到这一谈话的不止叶剑英一位。

还有两位亲历者也提供了简化版。一位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她回忆，1972年2月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之后的一天，对她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吴旭君反问怎么只有两件，毛泽东答：“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吴旭君的回忆比叶剑英的讲话简略，但时间、场合很明确。另一位是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她记得，1973年，在游泳池开中央政治局会，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她在场。（4）张玉凤所忆最简单，但也说明了场合和大致时间，只是没有说哪一次政治局会议。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毛年谱”）记载，1973年毛泽东先后五次召集政治局会议：3月1日、5月25日、7月10日、8月18日、12月12日和15日，地点均在中南海游泳池（5）。5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了“文化大革命”问题，对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不以为然，肯定“文化大革命”是“伟大胜利”（6）。也许可以据此推断，毛泽东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两件事”的谈话。

上述三则材料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三位亲历者的说法，因为都直接听过毛泽东的谈话，可信度较高。三则材料还说明，毛泽东不止一次讲过“两件事”，每一次的具体表述也不完全相同。但引人注目而又有争议的，却不是这三则材料，而是广为流传的下面这段：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7）

这段谈话，内容和篇幅都比前述三则材料充实，权且称之为完整版。完整版流传的文本很多，没有一个权威的文本。笔者从民间搜集的就有十几种，多是手写稿，也有油印稿和打印稿。各种文本的文字、标点都不尽相同，但内容、意思基本一致。

与简化版不同，完整版的来源无从查考。目前的说法，最早是1976年毛泽东在世时传出来的。胡绳在一篇文章中说：“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了他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这段话中最重要的是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取得了全国政权。他说：‘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要我及早地把那个海岛收回罢了。’然后他讲第二件事：‘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976年时，胡绳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当时因“批邓”运动处境不佳，但由于所在机构的关系，还是能了解一些高层信息的。在他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



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8）顺便提及，笔者在帮助于光远整理个人资料时，曾在其笔记本里见过两则“两件事”谈话的抄写稿。于光远当时也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与胡绳共事，是否也在当时与闻此事或得到传抄稿，不得而知。

有类似记忆的，不只是胡绳。前述注释提到的项观奇，时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文化大革命”时期经历曲折，后期参与过宣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项观奇在个人网文中，也确定他在1976年毛泽东在世时得到过“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9）

无论是胡绳的文章，还是项观奇的回忆，都没有说明传抄稿的来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完整版的流传更广，但很长时间里仍然未见权威依据。最早见诸公开出版物，是1988年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但没有注明出处（10）。2003年12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出版，第一次在此类权威研究机构编写的著作中引述了毛泽东关于“两件事”的谈话。最令人注意的是注明了来源：“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11）。然而，正是这个注释引起了争议。

与叶剑英讲话对照，“毛传”中所引不仅篇幅、文字不同，而且情绪、意思相去甚远。叶剑英讲话里，毛泽东是肯定“胜利地”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而“毛传”所引，毛泽东则认为“文化大革命”这笔“遗产”可能会在“动荡”中移交，还可能发生“血雨腥风”。前者情绪高昂，后者情绪低落；前者表达了自信，后者则对“文化大革命”前景充满忧虑。所谓“参见”，实际是“参”而未见。也许是这一原因，201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出版，有关“两件事”谈话的引述，改成了“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又以注释方式引述传抄稿（文字上与“毛传”略有区别），说明这一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资料”（12）。“毛年谱”的处理较之“毛传”严谨了一些，但完整版的来源仍存疑问。

## 二、时间和对象

有关完整版的疑问，不只是原始来源，还有不同文本的时间和谈话对象。就笔者所了解或掌握的文本，有以下几种说法：

（1）王年一的著作，提供了两个时间，一是1976年1月13日，一是1976年6月15日；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13）

（2）胡绳文章，时间是1976年6月13日，但没有提供谈话对象。（14）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传”，没有提供具体时间，只说“这一年”即1976年；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等人。（15）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年谱”，时间是1976年6月；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16）

（5）于光远笔记，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姚文元、吴德、汪东兴。（17）

（6）民间史料之一，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吴德、王海容。（18）

（7）民间史料之二，时间是1976年1月13日，谈话对象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华国锋、吴德、王海容。（19）

还有一个说法，据李海文的文章，1993年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毛泽东》，解说词说毛泽东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6月25日，谈话对象是华国锋、王海容。（20）

综上所述，谈话时间有五种说法，即1976年1月13日、6月13日、6月15日、6月25日、6月；谈话对象涉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华国锋、吴德、汪东兴、王海容八人。（21）谈话对象的考证，难度较大。前述八人都有可能听毛泽东谈话。因为华国锋已经否认听过毛泽东这段谈话，可以排除；另外七人中，王、张、江、姚、吴均已作古，生前亦无相关记述；健在的仅有汪东兴和王海容（汪东兴已于2015年8月21日去世——老高注），他们两位是否听过、何时听过这段谈话，只能期待他们自己证实。至于谈话时间，依据相关史料作进一步考证仍有可能。

五种有关谈话时间的说法，归纳起来是两种，即1976年1月和6月。余汝信、曾鸣的文章质疑6月谈话的可能性，颇有道理；但余、曾推断毛泽东没有作过这段谈话，则值得商榷。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自九一三事件后就急转直下，1976年更是恶化。据张玉凤回忆：1975年后，毛泽东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她还能听懂。每当毛泽东同人谈话时，她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毛泽东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她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毛泽东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只好用笔写出所思所想。后来，毛泽东的行动也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22）吃饭、饮水、服药都要张玉凤喂，原来每天还能吃一二两饭，到1976年四五月，每餐只能吃一两勺，而且吞咽不好，常常呛着咳嗽不止。（23）最严重的是，6月初，毛泽东还突发过一次心肌梗塞，经过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24）。

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透过相关文献资料亦可窥一斑。毛泽东的基本工作方式之一，就是批阅文件、材料、信函等。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年谱》，1976年1月至9月，毛泽东所写的批示或批语的文件、信函仅20件（致外国领导人的贺电、唁电这类仪式性文字，显然非他起草，不计在内）。其中1月份6件，2月份7件，3月份2件，4月份5件，5月以后未见批示。最长的批示是对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的回信，连同标点符号计86个字；最短的只有两个字，而且两个字的批示或批语有8件，占批示件数的40%。可见他写字已十分困难。

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的次数比上年锐减。1975年，连同4月份秘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毛泽东会见外宾共18次，其中前9个月9次。而1976年，毛泽东会见外宾仅6次，而且都在前5个月。会见的时间一次比一次减短：2月23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长100分钟（25）；3月17日，会见老挝领导人凯山·丰威汉，时长35分钟（26）；4月20日，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时长不详；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时长30分钟（27）；5月12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长20分钟（28）；5月27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长仅10分钟（29）。

9)。新华社当时发布的照片，前3次毛泽东都是站着与客人握手，后3次则没有。（30）不是记者没有拍到，而是毛泽东已经很难自己站立，需要靠人搀扶。这样的照片即便拍到，也不会发布。

毛泽东不仅会见外宾的次数大为减少，同党内、国内人士的谈话也极少。1975年5月3日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再也没有主持过任何会议，也很少或不愿同人谈话（31）。连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也不易见到毛泽东，只能在陪同外宾时向他汇报工作（32）。1976年2月至6月，华国锋只见过毛泽东7次，6次是陪同外宾，1次是单独谈话。华国锋不易见到毛泽东，未必是“四人帮”封锁（事实上，江青等人也很难见到毛泽东），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恶化。据“毛年谱”所记，1976年上半年，毛泽东听取党内人士汇报、同党内人士谈话，共计6次；其中1月份1次，4月份4次，6月份仅1次。听取汇报或谈话时，毛泽东因为发音不清楚，常常不易被听懂，需要依靠身边工作人员（主要是张玉凤）转述或“翻译”；有时工作人员都听不懂，毛泽东只能用笔写出来。写出来的字也明显看得出来手在抖动，完全失去从前挥洒自如的风格；个别字迹如果不看上下文，很难辨认。写的文字也很少，大多是单词或词组，少有连贯的句子。4月7日毛远新向他汇报天安门事件情况，毛泽东多以“好”“嗯”“是”“对”应答。谈及处理，毛泽东的指示是：“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33）4月30日会见马尔登后，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国内局势和工作，毛泽东说得更简单：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随即写下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34）6月25日同华国锋谈话，只写下一句话：“国内问题要注意。”（35）这是毛泽东一生最后的文字。

完整版的“两件事”谈话，逻辑严谨，语气连贯，表达清晰。以上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且在6月初突发过心肌梗塞，要在6月份讲出那段行云流水般的谈话，可能性不大。

### 三、推论和分析

那么，毛泽东何时作的完整版“两件事”的谈话呢？

据史料，1976年1月21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前一天政治局会议批评邓小平的情况，谈话如下：

主席：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意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

毛远新：还要创造条件，看实践怎样做到他自己的申明。小平同志讲向主席陈述自己的错误、听取教训外，还想讲自己的工作。

主席：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主席：对。

毛远新：上次主席讲征求几个人的意见，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提出国务院请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

主席：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36）

2月23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就国际局势和中美关系等，谈话100分钟（37）。看来，1976年一二月份，毛泽东尚能勉力作稍长些时间的谈话。因此，1月13

日毛泽东作这段谈话的可能性较大。宽些推论，毛泽东这段谈话可能是在1月8日至28日之间讲的。推论截至1月28日，是因为这天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两件事”的谈话带有“政治遗嘱”的意味，照理不会不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讲，但由于华国锋表示未曾听过这段谈话，所以谈话应该在毛泽东提议之前。

笔者这一推论，是建立在肯定毛泽东作过这段谈话的假设之上的。问题是，到底是否作过这段谈话？在缺乏原始档案或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将考证的焦点转向这段谈话的内容，不失为一个讨论的视角。透过谈话的内容，可以引起对毛泽东最后一段时光的心理分析和讨论，而这更具有解释学的意义。

完整版的“两件事”谈话，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有这么几点：（1）对“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2）“文革”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3）可能“和平”移交，也可能在“动荡”中移交，甚至可能发生“血雨腥风”；（4）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会如何对待这笔遗产，“只有天知道”。同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高昂情绪相比，这段话流露的毛泽东心理已不同往昔。他看到了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现实，但又有些无可奈何。毛泽东很清楚，他的体力和心力都已很难再支撑“这件事”了。

笔者以为，这段谈话与当时的事实相当吻合。九一三事件对毛泽东打击很大，他一方面“解放”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又反感把林彪问题定性为极左。看得出来，毛泽东的内心是矛盾的，既试图调整党内关系，又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当性。从1971年11月至1974年12月，毛泽东多次对老干部来信作出批示，或者解脱其囹圄之灾，或者指示安排其生活和工作，其中不乏受“大案”“要案”牵连的人物，如“二月逆流”中的谭震林、“彭陆罗杨”事件中的罗瑞卿、“杨余傅事件”中的杨成武、“七二〇事件”中的陈再道。最突出的，莫过于恢复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甚至在1974年秋冬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和中央副主席。毛泽东不是不知道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厌倦和抵触（前述毛泽东曾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过“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就是明证），但或许他是想透过上述调整来消除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而实际上，可能他自己也已感到了疲惫，发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的指示（38），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领导事实上是一定程度修正“文化大革命”极端政策的“各方面整顿”。

然而，1975年秋，“各方面整顿”方兴未艾，两封经由邓小平转呈的反映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谢静宜问题的来信，令视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再度敏感。毛泽东认为邓小平“偏袒”写信人，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指责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39）。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但是，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还有一批被“解放”的老干部都心怀不满。他没有想到，“解放”了的老干部并没有稀释对“文化大革命”的情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40）正所谓“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1949年以后，只要定性“路线斗争”，毛泽东多以强硬和激烈的党内斗争直至社会运动的方式解决，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邓（小平），林（彪）陈（伯达）莫不如此。但是1975年这轮“路线斗争”，毛泽东却采取了党内“打招呼”和“校园辩论”这种相对温和的方式。

1975年10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批评邓小平，但只是要求转告邓小平“不要上当”，要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和迟群、谢静宜研究处理。毛泽东说的处理，恐怕是指处理反映迟、谢问题的来信及问题，所以毛泽东的指示是：“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41）事情还限于很小范围。

28日，前述六人开会，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召集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再展开辩论；二是以来信为主要内容，在全校展开大辩论（42）。毛泽东同意的是第二方案。这一方案的关键，在于不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也就是不涉及邓小平本人。

11月1日晚，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既批评他转信的做法，也肯定了他前一段的工作（43）。第二天，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虽然批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算账”态度，仍然要求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谈话，要他“开门见山”谈意见，“帮助”邓小平“提高”（44）。

毛远新同邓小平的谈话并不愉快，邓小平反驳了毛远新对他主持工作以来的形势和工作的否定。对此，毛泽东没有激烈的反应，只是要求扩大高层谈话的范围，增加李先念、张春桥、纪登奎、华国锋。毛泽东提议讨论“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还承认“文化大革命”也有不足，即“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并指示对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45）

除了在中央高层“帮助”邓小平“改正错误”外，对党内老同志毛泽东考虑以“打招呼”的方式告诫和提醒。11月13日，他写了一则批语：“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一些老同志要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个人”（46）。周、李、二胡和刘、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后期先后复出工作的老干部，其中周荣鑫、胡耀邦、李昌、胡乔木等人直接参与了邓小平主持的整顿。11月26日，经毛泽东审阅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下发，再次向党内上层传达了他的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47）

到这时，毛泽东不打算以“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方式解决邓小平以及老干部的问题，而希望他们能够“转弯”，继续工作。一则李昌笔记也可以证明。李昌参加了11月16、17日政治局打招呼会议，毛远新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开一开好，谈一谈好。两个可能，一达到团结，一达不到。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总是把问题提出来了。”“小平他是不抓阶级斗争……他有进步，不要急，也要帮助他熟悉文化大革命的历史。”（48）尽管邓小平提出中央日常工作改由王洪文主持，毛泽东仍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49）大概毛泽东在等待邓小平“回心转意”。即使邓小平拒绝主持作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泽东仍然没有放弃。直到1976年1月20日，邓小平再次坚辞，毛泽东还是表示：“小平工作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50）

这一轮“路线斗争”没有采取强硬和激烈的手段，恐怕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以毛泽东晚年的身体状况，再开展一场“你死我活，你存我亡”的党内斗争或社会运动，多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心也不足了。二是毛泽东不希望改变九一三事件后中央高层的政治格局。“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位高权重，政治上平分秋色。九一三事件

后，林彪集团垮台，按说应该是江青集团地位上升，其中张春桥也的确进了中央常委，与他们有关系的王洪文还担任了中央副主席，但1974年和1975年，毛泽东两度批评江青等人搞“四人小宗派”“四人帮”。同时，毛泽东让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后来还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概毛泽东的设想是保持一种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为中坚力量的政治平衡，以维持既不偏离“文化大革命”轨道、又不致再出现大的动荡的局面。如果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出局，这种政治平衡的格局就会打破。所以毛泽东期待邓小平思想“转弯”，仍留在局中，虽然不再主持工作，但大致可以维系这种政治平衡。

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邓小平的问题还在等待之中，中央的日常工作由谁来主持？据张玉凤回忆：“周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情绪十分不好，烦躁不愿讲话。”（51）“总是在拨手指，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52）。毛远新也说过，“毛主席当时在几个副总理中间翻来覆去地琢磨，最后选定华国锋。”（53）“烦躁不愿讲话”，“总是拨手指”，“翻来覆去”，看来毛泽东在犹豫、踌躇甚至焦虑。更让毛泽东焦虑的，可能是人事更替后的变数和“文化大革命”的走向。历经十年“文化大革命”，党内和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不仅普遍缺乏认同，反而愈来愈不满；党内高层格局会不会改变，能不能支撑“文化大革命”的局面，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切殊难预料。

张玉凤回忆，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常常背诵庾信的《枯树赋》，情绪是很悲凉的（54）。事实上，这种孤独和悲凉很早就开始郁积了。据参与过为毛泽东标点和注释古文的朱永嘉说，1974年5月，毛泽东指示标点和注释5篇六朝古赋，即庾信的《枯树赋》、谢庄的《月赋》、谢惠连的《雪赋》、江淹的《恨赋》和《别赋》。（55）这些古赋多表达生离死别和背井离乡，格调凄凉哀婉：“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枯树赋》）毛泽东读古词，兴趣本来是“偏于豪放”（56），晚年却一反往日兴趣，对苍凉凄婉的词赋更为钟情。无怪乎朱永嘉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57）。1975年，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念过两句古诗：“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58）诗句出自清朝诗人严遂成的《三垂冈》。毛泽东晚年常常落泪，这是他身边工作人员多次忆及的。张玉凤就说过：“主席晚年常常泪吟《史记·汲郑公列传》中的一段话：‘一死一生乃见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59）。“泪吟”恐怕与贫富、贵贱无关，而关乎生死。倒不是他怕死，而是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终于发现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还是少数，担心其身后“文化大革命”如何延续，他开创的革命事业能否传承？“曲高和寡”，前途堪忧！到1976年1月，这种孤独和悲凉已经溢于言表。在这种心态下，毛泽东讲出那段“两件事”的谈话是有可能的。

注释：

（1）最近的争议主要是李海文、余汝信和曾鸣及项观奇的文章。李海文披露了1993年12月华国锋同她的谈话，华国锋表示毛泽东从来没有对他讲过“两件事”的话（《关于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世纪》2014年第3期）。余、曾文不仅质疑“两件事”谈话的真实性，而且推断这段谈话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理论界的观点和想法，在流传中附着在某位中央领导人身上，再演变成毛泽东自己的东西的。（《毛泽东“政治遗嘱”之谜》，《领导者》2014年6月号）。项文则肯定毛泽东作过这段谈话，称他在1976年“批邓”运动时就得到了这段谈话传抄稿，并援引其同事、时任山东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宋书星和时任山东省革委会常委的刘长茂的记忆作旁证（《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2014年1月13日；《（我保存的

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2014年1月31日。  
www.maoflag.org）。李海文披露的华国锋谈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口述证据，可以证明华国锋本人没有听过这段谈话，但还无法否定谈话的可能性。余汝信、曾鸣考证比较细致，结论却缺乏说服力。项观奇的记忆，说明了“谈话”传抄稿的时间，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否定了此为80年代思想理论界的观点演变而来的说法，但对“谈话”不同版本互相矛盾的细节没有任何说明。

（2）此处的“简化版”和“完整版”，是笔者为表述方便的说法，并非词义的严格表达。

（3）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77年3月22日）。

（4）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45页。

（5）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3—516页。

（6）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79页。

（7）《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1—1782页。

（8）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

（9）项观奇：《〈我保存的毛主席关于“一生做了两件事”谈话的传抄稿〉一文的补注》，2014年1月31日。

（10）史云称，最早将毛泽东这段谈话“公之于众”的是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一书。（史云、李丹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8卷《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孔》，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60页）此说有误，《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是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的，1988年12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已经披露这段谈话。

（11）《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2页。

（12）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

（1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0页。

（14）胡绳：《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5）《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81页。

（1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

（17）笔者所存复印件。

（18）笔者所存民间史料照片。

（19）笔者所存民间史料照片。

（20）李海文：《关于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世纪》2014年第3期。

（21）史云“根据有关资料”补充了汪东兴、毛远新（见《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孔》，第660页页下注），但未说明什么资料。如本文所示，不同文本已有汪东兴。至于毛远新，因史云未提供史料文本，拙作所列名单暂付阙如。

（22）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23）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

（2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38页。

（26）陈长江、赵桂来：《警卫队长的回忆：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249页。

（2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8页。

（2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8页。

(2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

(30) 见《人民日报》1976年2月24日、3月18日、4月21日、5月1日、5月13日、5月27日第1版。

(31) 参见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

(32) 抓捕“四人帮”后,陈云曾问华国锋那时能不能见到毛主席?华国锋说,见不到,只能在毛主席会见外宾时讲几句话。参见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月4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3页。

(33) 毛远新的笔记(1976年4月7日),转引自笔者所存于光远工作笔记抄件复印本。

(3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8页。

(3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49页。

(36) 毛远新的笔记(1976年1月21日),转引自笔者所存于光远工作笔记抄件复印本。

(37)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38—639页。

(3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43页。

(39)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1976]4号,1976年3月3日。

(40)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7页。

(41) 《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754页。

(42)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17页。

(4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19页。

(44)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19页。

(45)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20、621页。

(46)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23页。

(47)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共中央文件[1975]23号,1975年11月26日。

(48) 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5年11月16日)。转引自笔者所存李昌工作笔记复印件。

(49)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24页。

(50) 毛远新的笔记(1976年1月21日),转引自笔者所存于光远工作笔记抄件复印本。

(51) 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52)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

(53) 阎长贵:《贡献与缺憾——读〈国史〉第八卷》,见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第463页。

(54)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

(55) 朱永嘉口述、朱绍君整理:《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68页。

(56) 《毛泽东读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1957年8月1日),《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

(57) 朱永嘉口述、朱绍君整理:《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第77页。

(58) 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生活》,第34—35页。

(59) 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



□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3期

~~~~~  
【往事非烟】

吴晗为何被送上“文革”祭坛

• 虞云国 •

一

吴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缘起于毛泽东倡导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也许是不满干部中“报喜不报忧”的风气，他认为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敢言的精神，还建议找一位历史学家写这方面的文章。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就在全会上说古论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职、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与会的胡乔木回京让人找到了吴晗。吴晗便在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这篇千余字短文是他海瑞研究的禁脔初尝。

文章发表后，吴晗意犹未尽，还准备写一篇全面论述海瑞的论文，这就是当年9月21日才刊出的《论海瑞》。这篇论文起稿于庐山会议前，成文后却传来了庐山会议的结局。彭德怀在会上刚直敢言之举，是否也受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感召，不得而知。但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号召覆水难收，就在会上强调：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得知庐山会议的消息，吴晗在待刊的《论海瑞》结尾，特地加了一段声明：“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今天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吴晗站在毛泽东一边指责彭德怀，无论出于真心，还是迫于形势，都是一种政治表态。也许还有一种隐忧，不希望人们把这篇文章与彭德怀挂上钩。值得注意的是，庐山会议后发表的还有署名冯兵、立康的《真假海瑞辨》，也与吴晗持同样论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冒牌的海瑞，右派的海瑞”，与“真正的海瑞，左派的海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可证毛泽东关于真假海瑞的讲话已在内部传达。

当年岁末，也许受到沪上周信芳主演《海瑞上疏》的感染，马连良在北京也力邀吴晗为他写一台海瑞戏，用吴晗的话说，他自此就“和历史剧发生了深刻的关系”。1961年2月，《海瑞罢官》公演，叫好之声一片。连毛泽东也请马连良为他清唱海瑞的段子，并频频颌首道：“戏好，海瑞真是个好人。”毛泽东还对他提到吴晗：“《海瑞罢官》的文字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当晚，马连良就把毛泽东的这番话电话转告吴晗。可见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吴晗写海瑞与彭德怀挂上钩。

二

那么，毛泽东究竟何时才决定要批判《海瑞罢官》的呢？

据江青在1968年《为人民立新功》中披露，她早在1962年就找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准备批《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江青讲话虽有自我标榜的成分，但不至于无中生有，足见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这年，“七千人大会”刚开过，并对近年在所谓“反右倾”中被错误处分的绝大多

数人甄别平反。已经不清楚江青对毛泽东建议的批《海瑞罢官》的具体理由，但肯定将其与纠正“反右倾”扩大化联系起来。不过，“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的权威正处于低潮期，何况他一年前刚称赞过《海瑞罢官》，言犹在耳，自然不便马上对其进行批判。

另据康生在1966年5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早在1964年就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这点，1966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讲话中也证实：“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相比江青的理由，康生的“要害是罢官”，指责吴晗为彭德怀罢官鸣不平，更触动毛泽东的痛处。彭德怀问题，始终是他难以挥去的阴霾。据《彭德怀自述》，直到1965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第一次召见彭德怀谈话，一方面对他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一方面仍维护自己的正确性，认定自己“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大约就在1964年冬天，周恩来也许听说了有关流言，问过吴晗：“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听了吴晗的辩白，周恩来让他去写个报告，把整个情况讲清楚。

1970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

毛泽东所说的“那个时候”，可以与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里交代相参证：“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于1965年11月10日，江青奉命到上海组织此文应在今年三四月间，则北京三次找人未果，应在1965年二三月间。而毛泽东之所以在这时决定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则与吴晗当时推出的最新版《朱元璋传》密切相关。

三

《朱元璋传》是吴晗明史研究的代表作，初版于1943年。吴晗后来对这一版深致不满，他在1962年时承认：“1943年，我就写了《朱元璋传》。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指桑骂槐，强调明朝的特务统治，以攻击蒋介石的特务统治。”1965年新版《朱元璋传》自序重复了类似的话。

1948年11月，吴晗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呈上了《朱元璋传》的修改稿，受到了毛泽东两次召见。据吴晗说，“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朱元璋传》的原稿，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毛泽东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从向吴晗指出“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并在“完全”下加上着重号，毛泽东对这一稿《朱元璋传》并不充分肯定。尽管这一稿在次年正式出版，但吴晗对这一批评显然十分在意，便在1954年再次对《朱元璋传》进行修改，分发了百来本油印征求意见稿。从毛泽东处反馈过来的意见很明确：“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

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 ”也许察觉了毛泽东仍不满意，吴晗这一稿没有公开出版。

时隔十年，1964年吴晗再次改写《朱元璋传》，显然想给伟大领袖一份满意的答卷，企盼给他“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发一张毕业证书。但吴晗毕竟是书生，完全没有领会毛泽东关于“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的真髓所在。其失察还不止一端。首先，吴晗完全忽略了毛泽东领导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仍有农民革命的强烈色彩。因此之故，早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就热情讴歌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起义”，1949年以后，在他的推毂下；农民战争研究成为史学界的显学，因为他认为：“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其次，吴晗似乎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对此，吴晗虽未活到毛泽东一再以秦始皇自比的70年代，但从其在《沁园春·咏雪》中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挥斥评鹭，也不难略窥端倪的。关键的是，毛泽东一生倘若以1949年建国为界标，这时也应该算是步入晚年了。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在史学上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力图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跟上现实政治的需要，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尊重史实的史家良知。在新版《朱元璋传》里，吴晗从历史真实出发，对朱元璋该肯定的自然肯定，该否定的还是否定。在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论部份，他在肯定朱元璋历史地位的同时，几乎以相近的篇幅指出朱元璋的“缺点也很多”，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应该写得好点”的谕旨。吴晗归纳了朱元璋的五条缺点，许多表述都容易引起毛泽东的联想与猜忌，原书俱在，有兴趣者自可观赏吟味。要命的是，其中两条几乎是针对着毛泽东1949年以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运动而发的，不妨照录如下，并在关键表述下加标着重号：

“其次，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惨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卓著勋劳的大将和文人，毫无道理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

第四，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

曾经严格的史学训练让吴晗还不至于说出有违史实的昏话，但也正是这些真话，却招来了致命的一击。

最新版《朱元璋传》是1965年2月出版的，书一出版，江青就扬言要批判。据她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她当时不让毛泽东看《朱元璋传》，遭到反驳，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由此可证，吴晗对朱元璋的盖棺论定最终激怒了毛泽东，决定把他送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但毛泽东没有拿《朱元璋传》做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不好做，总不方便点明吴晗以朱元璋影射毛泽东，于是就拿《海瑞罢官》开刀。由此推算，毛泽东是在1965年二三月间读到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语，才下决心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的，并完成了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总体构想。

四

但是，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对江青也未必交代得一清二楚，故而由江青组织的批判文章居然没能点出“罢官的要害”。还需由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杭州谈话中加

以揭出：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吴晗一再申辩，他的研究只是为了歌颂海瑞的精神，并没有影射讽刺任何人物。他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仅举出《海瑞骂皇帝》刊发在庐山会议前，撇清了与彭德怀的关系；连《论海瑞》那个后来加上的蛇足式结语，也拿来证明自己是“反右倾”的。但说到庐山会议后的海瑞研究，尤其是《海瑞罢官》时，吴晗就进退失据了。他说：

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1959年，1960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吴晗不能解释为什么《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而《海瑞罢官》连目的性也“不清楚”，于是只能反问自己：

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古为今用”、“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实际上，在这场关于海瑞的公案中，不管吴晗如何解释，他已经走进了一个怪圈。史学的社会功能当然可以有现实的关怀。吴晗关于海瑞的所有文章与剧本，他对海瑞精神的讴歌赞美，客观上就具备了现实的指向性。他写《海瑞罢官》，用他在该书前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海瑞精神，“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压倒”，“办一些对当时人民有利的好事”。也许，写戏之时，在显性的主观层面，吴晗确实没有用海瑞比照彭德怀的用心。但彭德怀因直言民生而获罪罢官，其后全国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陷入困境，彭德怀也就有了海瑞式的品格。联系到吴晗被批后曾对秘书愤愤道：“彭德怀也是好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因而写戏之际，在潜意识层面，吴晗是否绝对没有从海瑞联想到彭德怀，就是殊难梳理辨清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拿吴晗与《海瑞罢官》开刀，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当然清楚，批吴晗的斗争并不是吴晗有多大错误，也不是吴晗该不该批，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掀起一个大的运动，最终达到打击党内的‘异己’力量，即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苏双碧《浪中纪事》72页）。除了对新版《朱元璋传》结论的耿耿于怀，主要因为吴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长，在文化上又是史学家，这种双重身份，正合适拿他来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过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吴晗首版《朱元璋传》是影射史学，那是专制时代的产物。而他关于海瑞的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新时代的奉命之作，那是现实政治干预史学研究的产物。但奉命史学与影射史学在表现手法上并无二致，都是以史料或史实屈就于预设的对象与结论。惟其如此，深谙史学的毛泽东就有理由把奉命与影射视为一体，甚至从求实的史著里也读出影射的成分来。于是，尽管吴晗最新版《朱元璋传》力图实事求是，洗刷影射的污垢，却仍被视为影射领袖与现实，最终与《海瑞罢官》缠夹在一起，锻就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一大

公案。

□ 原载《共识网》

~~~~~  
【劫后反思】

人类从不继承国王思想——兼谈文革初期自己的一点记忆

• 闵良臣 •

一年多前的2014年1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第20届年会，清华人文社会科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会上有个主题发言（主题是“回忆录·忏悔录·谈话录研究”），题目叫《文革的历史需要更多亲历者回忆》，这个发言的导语是：“只有人人都能回忆，回忆者才会尽可能求准确，只准一个人回忆，哪怕这个人并非存心撒谎，甚至这个人确实自以为真实，也会因为在无须面对挑战的情况下缺乏谨慎核实的动力而错误百出。”在发言中秦晖教授还说了这么一句：“民族的记忆是由无数个人的记忆汇成的。”信然。

一

近一年半载，中国大陆某些现象特别扎眼，……于是有人也就担心起来，这样做，会不会倒退到毛时代？会不会再来一次文革运动？见此情形，本人也有点不安，并想起自己小时候所经历的文革初期，而今年又恰逢文革五十周年纪念。

话说1963年秋本人入学，小学四年级正赶上整个国家狂风大作，举国动荡不安，怎一个“乱”字了得。约五十年后也还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在1928年就被红军“解放”过一次、1948年再次“解放”又近20年后被邻县人称作像“猪圈”似的（意为整个县城破烂不堪）大别山脚的小县城“大”街上，到处都有孩子拦着大人背诵伟大领袖语录，不背诵不让走。而自己当年也是这疯狂中的“小不点”。好来当时伟大领袖的“小红宝书”铺天盖地，即使进城卖柴火的乡下人，不少随口也能应付一二。这也难怪，彼时已是“祖国山河一片红”，广播喇叭里天天都在念“最高指示”，一天甚至要念几十上百遍，夸张点说，大家伙耳朵都听出了茧子，很少有人背不出几条“大救星”的语录。文革时期，一个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如果背不出几条“最高指示”，简直就是大笑话，人们看你会像现在看大熊猫一样。

当然，万事皆有例外，毕竟也还有背诵不上来的，那可就惨了。城里小学生原本就年幼无知，加上在那疯狂的年代，拦住行人后，不背诵一句不让走。这样，在我们县城的街上当时就可看到一道“风景”，即三三两两戴着“用烈士鲜血染红”的红领巾的“小不点”们与一些乡下人在那儿磨蹭：乡下人不会背诵，而小学生又认死理不让走。今天想来，真是荒唐至极，完全可载入《二十世纪奇观》。

好在那年代，谁都不敢拿政治开玩笑，更不敢对爹亲娘亲都不如的“伟大领袖”有丝毫不敬——会背诵者，被我们这些孩子一拦住，都是赶紧背诵一句了事，比如要公私批修，比如要为人民服务，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比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自然也有人会来句长点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约五十年后还记得一件事，自己与同班同学尹学友（真想不到约五十年了还能记起这

个小学同学的名字)在我们那靠城西的一座名叫西大桥桥头,两个“小不点”也不知哪来的胆量,站在马路中间,拦下一辆疾驶而来的大货车。车一停,我和尹学友就扒上车头两边车门,要求司机背诵毛主席语录,司机自然背了一条,不过紧接着也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你们这样做很危险。

半个世纪后想想,实在对不起那司机,估计我俩的行为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可人一疯狂起来,不论男女老少,都会把危险置之度外,或者说简直就没了危险意识。只是谁也不会想到,在路上拦住人要求背诵伟大领袖语录,只是疯狂的开始,更大的疯狂和危险正等待着六亿“舜尧”们——解释一句,按顺序,应该是尧舜,可当年伟大领袖做诗为了押韵,只好把两位古人调了一下先后。

自然,虽然更大的疯狂还在后面,印象中最疯狂也就那么两年时间。这也说明,凡事一疯狂,必不能长久。

## 二

又记起早些年在广州《随笔》杂志上读到过一篇随笔,到了现在,内容主题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但作者在文章中说他的乡下舅舅有次去京城看望他这个城里亲戚,跟他说,走过天安门时,见到城楼上悬挂的那幅巨大画像,觉得毛主席其实就是一皇帝——这句至今不忘。

所以说,前段时间宣扬的“两个务必”也好,“走群众路线”也罢,再加上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都是前国王思想,而且历史告诉我们,都是前国王做的表面文章——究其一生,从未两个务必,从没走过群众路线,从没接受过别人批评,更没真心作过什么自我批评。彭大将军庐山上只是在信中对他这个“老战友”说了几句真心话,立即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诬其“里通外国”,是“反革命军事俱乐部”头目;而第一个提出要把他的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的刘少奇与其某些想法不同,更是惨死在开封,连骨灰盒上都不是自己的姓名,好像叫什么“刘卫黄”吧。

再说,两个“务必”管用吗?走群众路线管用吗?批评与自我批评管用吗?真管用,前国王倡导几十年,中国社会官风、民风也不至沦落到如此地步。倒是那些从不提两个务必、从不讲走群众路线、从不说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国家,不仅天下太平,而且官民文明程度都大大高于我们这种社会。

就算不是做表面文章,国王的思想也不值得继承。其理由就是:国王并非人类最优秀者,更不等于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

前国王虽然并非世袭,却也是用了各种计谋,加上各种阴差阳错,才做上国王宝座。这些,可怜的百姓当然不知,可你去问问死去的前总理,他一定会告诉你详情。所以说,一个人能做上国王,自己的真本事只是条件之一,甚至一点真本事没有,照样可做国王。

希腊两千多年前就有人要把国王“弄成可以惩罚的”,这表明人类自从出现国王后就对国王表示不满。世界历史不说,中国历史上据说有大小上百次农民起义,说到底,一次次都是要推翻国王。

国王不是人人能做的,但很多人都能做国王,也不是说着玩儿的。正如一位朋友在一

篇长文中所言：“中国皇帝的权力威风与特权利益最大，所以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人人都想当皇上，只是很多人不愿说，不敢说，不能说罢了。”

人类更没想过让哪个国王万岁万万岁。在下面喊万岁的多是随大流，而且其中有不少喊万岁者都巴望国王早早下台，甚至一命呜呼才好。

国王的思想，其实也就是一个人的思想，而且还并不等于就是“伟大的思想”。正如历史学家、美籍华人黄仁宇在他的名著《万历十五年》中所说：“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过理智的范围，都带有宗教的色彩，这才使成为他的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79～80页，中华书局出版）

而只要不是伟大的思想，有什么好继承的，又怎么能继承。如果就是因为是国王的思想就要继承，那么，我敢说，也就没有今天的人类——我们大家有谁知道五千年前的国王是什么思想？肯定没有——噢对了，五千年前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国王，只有族长，只有占山为王的山大王。尧舜只是传说，就算不是传说，也没有五千年。

可三千年前还是有了吧。然而我们今天有谁知道三千年前国王是什么思想？周厉王好像也只有2800多年，更重要的是，有谁敢站出来说还要继承周厉王那种国王的思想呢？

国王也有著作，但国王的著作绝不等于就一定有博大思想。前段时间在互联网上见有位画家叫葛小光，信心满满，说他为“新中国”60年华诞画的那幅挂在天安门城楼的巨幅画像，就是“力求通过对毛泽东眼神的刻画，表现出一代伟人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襟”。

其实，前国王有什么“博大胸襟”？真有博大胸襟，土改时也就不会杀那么多人，就不会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针对当时有人说“你们独裁”时这样回敬道：“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见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1966年7月改横排本第四卷第1364页）

我们今天知道，人类是所有人的，不仅是他毛泽东所定义的“人民”的，同时也还是他毛泽东所定义的“反动派”的。既然他毛泽东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就有可能剥夺一切他认为不是人民的人的发言权，而事实上，他领导下的整个中国就是这么干的：昨天还是人民的人，一夜醒来，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自然，也就只有受批判的份儿，而没有了“发言”的权利。而且还不仅仅是对普通百姓这样干——昨天还是他的战友，且作诗褒奖为“看谁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今天就成了他的敌人，而一成他的敌人，遭受到的就是残酷无情，“不死也要脱层皮”。

所以，我们只知道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是经典，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是经典，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是经典，没听说前国王包括文化革命时期炒作的“五篇光辉哲学著作”和上面提到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2012年100多名知名学者、作家们奉命抄录的那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人类经典。

早先看过一个统计，秦嬴政之前的不说，自始皇帝以降，中国大小皇帝近五百个，然

而我们没听说今天哪个有真正现代思想的人要继承其中某个皇帝的思想。

皇帝的思想，都不过是一家一姓的思想，而且一旦做了皇帝，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让这一家一姓万代相传，然后就是防止臣民尤其防止宫中别有什么人大逆不道，谋反篡权。试想，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这个国王还有什么博大胸襟、博大思想？前国王在夺取政权后的近三十年里，又写出几篇有思想、有胸襟的文章？

2016-2-2日定稿

□ 摘自作者博客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